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考古学研究

(十)

庆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考古学研究

(十)

庆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著名民族考古学家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全书收录学术论文 34 篇, 涉及民族考古学、史前考古学、夏商周考古学、文明起源与聚落考古、区域研究与其他等五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纪念类文章 1 篇, 详细介绍了李仰松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活动。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研究. 10, 庆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2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ISBN 978-7-03-036254-4

I. ①考… II. ①北… ②北… III. ①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6155 号

责任编辑: 刘 能 / 责任校对: 赵桂芬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王 浩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41 1/2 插页: 6

字数: 968 000

定价: 20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Archaeology Series, Peking University

A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Archaeology

(X)

Festschrift in Commemoration of Professor Li Yangsong's
80th Birthday

Compiled by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Science Press
Beijing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赵 辉

副主任：徐天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迅	王幼平	韦 正	刘 绪
齐东方	孙 华	李水城	李崇峰
吴小红	宋向光	张 弛	张 辛
林梅村	杭 侃	赵 辉	赵化成
秦大树	徐天进	黄蕴平	雷兴山

《考古学研究》（十）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凤琴 杨学祥 庞雅妮 赵春青

目 录

壹 民族考古学研究

民族考古之路	宋兆麟 (3)
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贡献	陈 淳 (6)
吐蕃“赭面”习俗再观察	李永宪 (18)
论古代系绳石刀的功能——兼谈民族考古学方法	罗二虎 李 飞 (27)
海南岛本地黎民族考古调查报告——方通村的生态环境与本地黎文化	赵春青 (36)
彝族火葬习俗探讨	杨学祥 (176)
试论史前中国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历史进程	杨 群 (211)
郁鬯琐考	何 弩 (244)
河南巩义市北侯村现存的陶器磨光工艺技术调查	付永旭 (255)
陶器标准化意味着什么?——北侯村席怀军所制陶器的标准化程度研究	郭 梦 (265)

贰 史前考古学研究

嵩山东南麓 MIS3 阶段古人类的栖居形态及相关问题	王幼平 (287)
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巩启明 (297)
试论关中仰韶文化早期的折腹罐	张天恩 (310)
西山城的情境分析	余西云 赵新平 (317)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	张 弛 (324)
豫西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研究	魏兴涛 (352)
试论商洛东龙山遗址所发现的龙山时代遗存	杨亚长 (390)
东灰山遗址炭化小麦再议	李水城 王 辉 (399)
柳湾各期墓葬的埋葬过程及相关问题——从磨沟墓地说起	钱耀鹏 (406)

叁 夏商周考古学研究

从稍柴遗址看二里头文化的形成	袁广阔 (433)
郑州人民公园地区商代墓地族属试探	郑杰祥 (440)
垣曲商城兴衰始末	佟伟华 (446)
西周王年的调整	王恩田 (455)
晋文化撷拾——以河南为例	杨育彬 (459)
东周时期城市规划的新风格	牛世山 (473)
尚孟铭文与周代的聘礼	孙庆伟 (506)

肆 文明起源与聚落考古

从崧泽到良渚——关于古代文明演进模式发生重大转折的再分析	李伯谦 (517)
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	田建文 (530)
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戴向明 (539)
关于史前晚期聚落遗址“按大小论等级”思想的有关问题	裴安平 (582)

伍 区域研究与其他

石峡遗址发掘与分期	朱非素 (595)
虎头埔文化诤议	李 岩 (603)
东阿尔泰山地区的祭祀遗迹	刘文锁 (611)
国际交流背景下的秦兵马俑展览现象之分析	庞雅妮 (631)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拓荒者——庆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仰松教授 八十华诞	刘凤琴 庞雅妮 赵春青 杨学祥 (639)
编后记	(654)

壹 民族考古学研究

民族考古之路

宋兆麟*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人物》专栏曾专访我，并以《民族考古学家宋兆麟》为题进行播放，还以同名出版了一本书。对此我实在不敢当，因为民族考古研究做得比我好的不乏其人，其中就包括我的老师李仰松先生、学长汪宁生等人。

李仰松先生没给我上过课，但经常担任林耀华先生的助教，也给我们不少指导，更为重要的是，他曾参加过1956年云南佤族社会历史调查，对我影响较大，总结起来基本有三点。第一，李仰松搜集了许多佤族的历史文化现象，利用活态的民族学资料去研究，印证考古问题，如制陶术、酿酒起源，把考古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互相印证，相得益彰。这种新的、民族考古比较研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当然，民族考古比较研究过去不少学者都提出过，可惜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实践，而李先生是真正吃螃蟹的人，使我们后来者少走了不少弯路。第二，李仰松先生是考古学出身，对绘画、插图比较重视，在他参与编写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有不少精美的插图，在同类调查报告中开了好头。事实上，一般人对物质文化比较忽视，有插图者更寥寥无几，李仰松把考古学的绘画方法带到民族学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一般搞民族学的人，不大重视拍摄民族文化照片，留下的民族学照片极少，这是很遗憾的。过去李仰松先生在佤族地区还拍了几百张照片，有些极为珍贵，如房内壁画、人头桩、制陶方法，这些是后来者所看不见的，听说李仰松先生将其捐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令人们敬重。实际上，照片应该是民族调查的记录方式之一，必须大力抓一下。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除了接受李仰松先生教导以外，还参加了一次广西民族调查。2012年3月，《中国文物报》曾以“大学期间的民族调查”为题，翔实介绍了上述调查。这次社会实践对我走上民族考古之路有重要影响。

做学问，一要靠个人努力，我虽然不聪慧，但学习还是很勤奋的，做事也用心，但这是不够的。二要遇到机会和单位提供的条件，我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正赶上拯救民族文物机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也给我提供了有利条件。

1961年暑假，国家文物局组织翦伯赞、吴晗、翁独健、韩儒林等专家赴内蒙古呼伦贝尔考察民族文化，事后专家提出，民族地区即将发生巨变，传统文化将消失，建议国家文物局应该把典型的、不同社会发展的民族文物拯救下来，以备将来展览、研究之用。翦伯赞还提示，将来重建历史博物馆时，应该中央为走廊，两侧为展厅，一面用考

* 宋兆麟，中国国家博物馆，100006

古文物讲述历史，一面以民族资料讲历史，那样中国历史就活泼多了。

国家文物局接受了上述意见，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完成此任务。由于我年富力强，又参加过1958年全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馆领导就把抢救民族文物的任务交给了我。

怎么搞民族调查，搜集民族文物，我的心里也没有底，但李仰松先生的实践对我启发多多。

我的调查工作是：1961年内蒙古大兴安岭调查，搜集了1000多件民族文物，我还随猎人在林海雪原中进行若干天狩猎，亲自体验了一下狩猎生活。1962年去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调查，搜集农奴制文物10000多件，还复制了大批傣族文书。1963年初，又转向云南西北泸沽湖地区，对摩梭人走婚和母系家庭进行调查，搜集3000多件文物，用40匹骡子才驮出来。1964年又对云南小凉山彝族进行调查，搜集不少民族文物。“文革”十年，民族文物征集工作停止了，事后又先后对盐源摩梭族走婚和母系制，木里纳西族伙婚，苗族、四川大凉山彝族和海南黎族进行调查，搜集了不少民族文物。

以上调查，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时间长，少者三个月，多者十个月，有些地区还反复去过多次，决不走马观花；第二是先易后难，特别是涉及隐私的领域，一定要有相互信任后才能进行；第三是调查方法多样性，一是搜集民族文物，这些已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二是做好文字记录，一个地区起码有五本调查笔记，三是拍摄了大量照片。我的调查有一定特点——抓民族文物。一般搞民族学的人，比较注意阶级关系、社会形态，不关注物质文化，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主要抓民族文物，抓民族形象，侧重物质文化研究，这是民族学者所不注意的。我的研究既依靠考古资料，又离不开民族学资料，进行民族考古比较研究，从而走上了民族考古之路。

这条道路是否可行呢？20世纪80年代是有争论的，一种认为我的治学方式不是考古学的，在郑州考古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我；另一种意见又支持我，而且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记得1981年在杭州举办中国考古学会时，夏鼐先生对我很关心，提出：“你在历史博物馆也不顺心，可否到考古所来，当考古编辑，就不必下田野了。”我说：“谢谢，让我先考虑考虑。”事后我专门请教苏秉琦先生，他说：“千万不行，现在我们找一个考古编辑不难，找几个搞民族考古研究的困难，现在不是‘南汪北宋’吗，这是对你们的肯定，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改行当编辑。北大李仰松在这方面也搞得不错，但他首先是教师，在研究经费和时间上远不如你们优越。”他又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吗？你们提倡为人民服务，从学科上看，人民需要你研究民族考古，而不是当编辑，目前工作上可能有不顺心的地方，那是暂时的，将来会好起来，一个民族不能没文化。”

苏先生的讲话，有理有据，令我佩服，从而更加确定我走上民族考古研究之路。

其实，民族考古是一个概念，具体分为两类：一种是边疆地区民族考古，如吴越考古、匈奴考古、滇文化考古、南诏考古、辽金考古等，这些才是真正的民族考古，在我国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队伍很大，人员很多，贡献卓著，这是我们首先应该重视

的；另一种是民族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如李仰松、汪宁先和我基本属于此类。

在上述两种民族考古中，前一种我也做过一点，如景洪新石器时代考古、泸沽湖新时代考古、博什瓦黑南诏石刻考古等，但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后种身上，即从事民族考古比较研究。

夏鼐先生给我们讲《考古学通论》时，曾说过，考古学是利用地下发掘的实物研究人类的过去，我基本是按着夏先生的方法做的。如石球是怎么投掷的？钻木取火分几个步骤？耒耜是什么结构？“二牛三人”犁是怎么回事？造纸有哪些工艺？文字怎么起源？婚姻家庭怎么演变？民间信仰有哪些内容？上述问题都是考古学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具体研究，主要利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研究问题，所不同的是我大量地引用民族地区的“社会活化石”去加以印证，解释考古学的“死材料”。须知，中外现在所保存的民族学资料，都处于现在文化包围之下，已经不是完整的社会制度，而是一种残余形态。所以我们不能以一个民族的社会形态去套用考古学有关资料，但是可以用民族学中的个案去解释考古学中的个案，这些方法在我的著作《中国远古文化》、插图本《中国原始风俗史》、《巫与祭司》、《中国生育·性和巫术》中都有反映。此外我还出版了一套多卷本《边疆民族考察记》，这也是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写法。

前几年学术界有过一场辩论，题目是“民族考古学是一个考古分支学科吗？”争辩相当热烈，由于双方都是我的朋友、学长，我不便参加，最好让后人评说。我个人的想法是，首先应该对民族考古学有一个科学界定，是真正的民族考古还是民族考古比较研究？其次，如果把民族考古比较研究当成一个分支学科的话，它应该有理论著作、代表作品，目前还欠火候，尚不能构成一个分支学科，至于将来是否成为一个分支学科，目前还不得而知。最后，无论是民族学或民族考古比较研究的民族学，在现代社会变化极为剧烈，民族文化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上述研究越来越困难，从事研究的人也会越来越少，这是应该充分估计到的。

做学问好像是一条流淌无尽头的长河，每代人介入其中，宛如参加一场接力赛跑，只能接一棒，但要跑快，跑好，跑出特色，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对自己的民族考古比较研究的做法，还是满意的，无怨无悔，但我不会忘记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和遇上了好机会，也牢记国家博物馆给我的有利条件，还有培养我的北京大学。

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贡献

陈 淳*

一、前 言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被看做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学科分类或定位上归属于历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种分类或定位是受我国学术传统影响的结果,并源于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考古学被我国史学界用来解决上古史的争议。傅斯年将考古学看做是一个不陈的工具,可以用它来处置些新获见的材料^①。而夏鼐将考古学与文献探索为基础的狭义历史学结合构成了广义历史学,犹如车的两轮,鸟的两翼,不可偏废^②。最近,考古学脱离历史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表明我国学界认识到考古学的独立性。因为,考古学与历史学虽然在目标上相同并在研究上互补,但是它们在研究材料和理论方法上相去甚远。

大体来说,历史学是研究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③,或者如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所言:“考古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的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④由此可见,考古学的潜质和任务主要是从古代社会遗留的物质遗存来了解历史和社会变迁。为了研究这些遗存,考古学家采用源自地质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并加上他们自己发明的技术,以便在没有文字的帮助下来了解和解释过去。因此,考古学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家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读懂”这些从地下出土的无字材料,并用这些材料来重建历史^⑤。

由于大多数考古材料无文献资料可供参考,这些物质遗存也并非不言自明,因此考古学家的研究更像是自然科学的探索和实践,需要对材料进行采集、分类、描述和阐释。我们熟悉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就是处理材料的方法,但是要读懂这些材料,单凭分类和建立年代学是不够的。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指出,考古材料的阐释受民族学和历史学概念的影响特别大,这两门学科与考古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来

* 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433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1期。

② 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1期。

③ 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考古学”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④ Clarke D L. Archaeology, the loss of innocence. *Antiquity*, 1973, 47: 6~18.

⑤ Crabtree P J, Campana D V.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自地质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理论概念,或直接或通过人类学和历史学对考古学施加影响^⑥。由于我国考古学家主要是在历史学领域里受训的,将考古材料与文献相结合来做解释是得心应手的传统。相对而言,人类学和民族学在我国并非显学,在传统和研究上都比较薄弱。本文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顾一下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考古研究中,如果对于无法从历史资料中找到说明依据的材料或现象,考古学家一般采取常识性类比的方法来解决。比如将石刀和石斧与我们熟悉的刀斧比较,将史前陶器与青铜时代的类似器物或我们常用的器皿做比较。但是,考古材料的复杂性和探究问题的多样性并非单凭这种常识类比就能解决,因为许多现象远非单凭考古学家的常识和历史知识所能解释。在欧美考古学的发展中,民族学作为考古学阐释的重要参照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为考古学家的器物分析提供借鉴,为透物见人提供一座桥梁,并且为重建古代社会变迁的过程提供通则性的模式。

二、对史前研究的贡献

对于有三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而言,五千年的成文史与之相比连百分之一的比例都不到。因此,有文字的历史只是“一出长剧的最后一幕”。人类历史中存在大段文字记载的盲区,就是史前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考古学的主要理论方法都是在史前考古学领域中创造出来的。是历史材料最为贫乏的北欧成为科学考古学的摇篮,使得丹麦的汤姆森和瑞典的蒙特柳斯创立了三期论和精致的器物类型学。埃及学家皮特里在发掘法尤姆前王朝墓地时,由于没有象形文字可供断代,便创造了独特的器物排列法对陶器类型进行年代学研究^⑦。同样,是文献资料最为贫乏的北美,考古学家们创造出各种理论方法来从物质遗存中提炼信息以重建史前史。这是值得我国考古学家深思的问题,也许正是过分依赖文献和强调两重证据法,使得我们忽视了独立创造和发展理论方法的必要性。在欧洲,考古学并非历史学的工具和延伸。对于了解史前史,历史学的帮助十分有限,因此更需要采取各种类比,将我们所不知的东西与我们所知的东西比较,其中民族学的作用尤大。

认识史前人工石器就是一个例子。很久以前,地下出土的石器在欧洲人的认识和收藏中被放在矿物和化石的范畴之中,与玛瑙、玉髓、绿松石、钻石和陶土等为伍。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从地下长出来或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就如人们所见的流星。于是,这些石斧和石器被称为“雷石”。到17世纪中晚期,对于地下出土的化石有了进一步的区分。丹麦地质学家尼古拉斯·斯坦诺(Nicolas Steno, 1638~1686)对水晶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化石贝壳及现代贝壳的结构进行比较,显示化石贝壳与现代贝壳的关系要比水晶更加接近。于是斯坦诺断言,化石贝壳并非地下自己长出来的物体,而是曾经活过的、后来被埋在土里的动物遗骸。在认识石器的过程中,民族志类比所发挥的作

⑥ 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⑦ Malina J, Vašíček Z. *Archaeology Yesterday and To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用,就如斯坦诺对现代软体动物与化石贝壳所做的观察。到17世纪晚期,欧洲人不仅对非西方的石器工具已有所知,而且还用他们的现代工具来与石器进行类比^⑧。

然而,民族志的类比出现较晚。16和17世纪是西欧展开环球航海的大探险时代。航海家们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见到了石器时代的各种狩猎采集者和原始农人。这些土著的工具和服饰被作为珍稀之物带回欧洲,欧洲人发现,这些土著不知金属为何物,仍然在使用和他们在地下发现的石器非常相似的工具。这一发现促成了史前研究最重要的进展,即意识到欧洲出土的石器工具是人类制作的,并非自然或超自然的起源。16世纪晚期,英国古物学家约翰·特怀尼(John Twyne)根据古希腊民族志推断,在公元前第一千年里,北欧人的生活方式很像石器时代的北美印第安人。17世纪,英国人对新大陆的土著居民有了日益增进的了解,著名古物学家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提出,史前英格兰人的生活很像美国弗吉尼亚的土著。古物学家威廉·达格代尔(William Duglale)将英国发现的石器归于古代土著布列吞人,并断言它们的制作和使用早于铜器和铁器。达格代尔的女婿和阿什莫尔博物馆的管理人罗伯特·普罗特(Robert Plot)认为,我们若要了解史前的石器如何装柄,可以将它们和北美印第安人的装柄石器进行比较。之后,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将英国的石箭镞与太平洋群岛上现代居民制作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即前者很可能是由不知道如何生产铁器的一类民族所制作。18世纪初,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朱西厄(Antoine de Jussieu)将欧洲石器工具与从新法兰西和加勒比海带回的民族学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他声称:法国、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的人们,他们要不是发明了铁,很可能就类似今天的那些蒙昧人那样生活。到了18世纪,不仅石器工具是人工制品,而且它们的时代非常古老的想法已被广泛认可。

用民族志类比的方法,除了确认史前石器工具是人工制品外,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文化和技术的进化思想提供了证据。欧洲航海家在大航海中邂逅了土著人,发现他们不知金属为何物。这种事实也符合欧洲人的圣经教义,即那些无法与上帝保持接触的人群,因无法持续得到神谕,会在道德上和技术上日益退化。所以,冶金术可能被那些迁移到了没有铁矿地方的民族所遗忘。但17世纪以降,启蒙运动和日益增长的进步信念得到了逐渐强调理性主义的补充。人们鼓励一种更加理性的方法来了解自然,并相信人类的创造力是进步的,并非处于持续退化之中。1734年,尼古拉斯·马胡德尔(Nicolas Mahudel)向巴黎的铭刻学会宣读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石、青铜和铁三个相继时代作为对人类发展的一种解释。这显然是汤姆森三期论的先声。由于缺乏适当的断代方法,18世纪的古物学家常常采用比较民族学、比较语文学、体质人类学、民间传说和口述传统来评估他们发现的史前古物。

在考古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考古学研究除了表现出显著的地质学特点外,还体现了强烈的进化论取向,即以器物构建人类文化发展的序列。除了三期论,法国考古学家莫

^⑧ Grayson D K.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 Antiqu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尔蒂耶也用进化框架来构建法国的旧石器序列,并认为这一序列可适用于欧洲其他地方,乃至全世界。18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不仅是一种生物演变的理论,而且是一种哲学思想,被许多科学家用来解释社会现象。于是,石器时代和原始社会被视为由许多阶段组成的直线序列,并不关注同时性的差异。直线进化论还鼓励一种信念,即现代民族志材料可以被用来说明史前文化发展的一般进程。这种信念还得到了启蒙运动心理同一性的支持,即认为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在面对相似的问题时一般会做出相似的决策。于是,舍利人被等同于塔斯马尼亚土著,莫斯特人等同于澳洲土著,梭鲁特人等同于爱斯基摩人。这使得许多学者认为,根据处于不同发展层次的现代土著社会的比较,有可能用来说明欧洲史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文化特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他提出的蒙昧、野蛮到文明的三期文化进化论,是对人类社会直线进化普遍规律的阐释。摩尔根的蒙昧阶段大体对应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经济特点为狩猎和采集。野蛮时代对应于新石器到铁器时代,这一时代出现了农业和家畜,发明了陶器和金属工具。文明时代以文字出现为标志^⑨。

摩尔根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并较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体现的文化更加完备。它们对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所能提供的资料,其丰富性无与伦比。由于人类的起源只有一个,而且其途径相同,因此凡处于相同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因此,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和经验,足以代表我们远祖处于相同状态下的历史和经验^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从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来探索文明和国家的形成。

受摩尔根和马恩人类进化思想的影响,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他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将欧洲和近东的考古资料用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来加以编排和阐释,以重建人类的文明史。柴尔德的蒙昧期以旧石器时代为代表,野蛮期以新石器时代与红铜时代为代表,文明期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革命和埃及与印度的早期青铜时代为代表^⑪。虽然柴尔德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创始人,但是他对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地。他认为,民族学和考古学是人类科学两个互补的分支,就如生命科学中古生物学与动物学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人类99%的历史是史前史,因此必须依赖考古学来重建。但是很遗憾,考古记录很不平衡,只能体现文化的某些方面。考古学家对其进行分类,建立技术阶段并进行文化分类,确立时空的发展序列。民族学也研究较为简单的社会,对这些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观察和分类,并建立起相似的发展序列。将考古材料与民族学记录相对应,在比较民族学的框架中根据文化的相似性方面为社会分类,并用考古学来安排其时间序列,这就能显示发展的方向。柴尔德指出,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以协调功能论、传播论和进化论,可以为推断无文字的社会提供

⑨ 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⑩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⑪ 戈登·柴尔德著,李宁利译:《历史发生了什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基础，并能为建立历史变迁的通则开辟光辉的前景^⑫。

在北美，考古学属于人类学的范畴，除了考古学研究的是印第安土著而非欧洲殖民者自身的历史之外，还因认为史前和现代美洲土著人群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区别，历史时期的民族志资料可以直接用来解释史前考古材料。了解过去使得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以及与土著群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土著居民不再以传统方式生活的地区，考古学家便参照早期欧洲人有关印第安人的历史记录来进行解读。于是，在北美考古学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研究与阐释方法——直接历史学法。这种方法被定义为利用活体文化的历史或民族志信息来解释同一文化，或历史上关系密切的文化较早时期没有文字记载阶段的考古发现^⑬。

美国直接历史学法的一个例子就是解释印第安土著“如何制作箭镞”。早期记载对箭镞制作的大部分观察语意不祥，这是因为这些观察者没有实践经验，对石器打片过程缺乏了解。1911年，加州当局抓到了一名叫伊希（Ishi）的印第安土著，他是一个名叫雅纳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最后一位幸存者，该部落在19世纪为了逃避屠杀而躲入加州中北部的深山老林之中，由于环境极其艰苦，这个部落濒临灭绝。在目睹了最后亲友死于苦难之后，绝望和饥寒交迫的伊希潜入一处欧裔美国人的聚落偷窃食物，结果被狗包围。他作为加州最后一名“野生”印第安人被拘禁，主要的原因是大家不知道如何与他相处，而非对他有敌意。当该消息见报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人类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伯（A. Kroeber）和沃特曼（T. T. Waterman）将伊希解救出来，安置在旧金山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里，他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余生，最后死于结核病。伊希是一名压制石箭镞的高手，他向人类学家和博物馆参观者表演他的石器制作技巧。伊希是一位被观察最为仔细，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位依赖石器技术生存的美洲印第安人。他启发了萨克斯顿·波普（Saxton Pope）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土著人的弓箭。包括内尔斯·纳尔逊（Nels Nelson）在内的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同时研究史前和现生的人群，他们向伊希学习，根据对土著的观察和自己的实践，掌握了石器打片的基本诀窍，并用这种知识来解释史前的考古材料^⑭。

20世纪初，史前考古学见证了从进化论范式向历史学范式的转变，考古学文化取代了阶段和时期，成为考古学的主要分析概念，标志着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诞生。虽然考古学以文化历史为取向，但是其文化概念也是来自民族学而非历史学。考古学文化类似于民族志文化，即将考古学文化看做是过去活体文化的物质遗存^⑮。格林·丹尼尔（G. Daniel）指出，20世纪初，考古学的进展从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中获得了新的指导方针。这是因为，考古材料的积累表明同一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这标志着莫尔蒂耶直线

^⑫ 柴尔德：《人类学与人类学》，见柴尔德著，方辉等译：《历史的重建》（附录），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Childe G. V.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46, 2 (3): 243 ~ 251）。

^⑬ 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⑭ Whittaker J. C. *Flintknapping: Making & Understanding Stone Tool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5.

^⑮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文化在欧美的发展》，见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时间与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